

對澳門語言政策的反思*

Maria Trigo **

《在粵語和國語之間，葡萄牙語摻夾其中且無從選擇……》，這是不久前我在澳門某週報上發表的一篇關於雙語制問題的文章。顧名思義，文中所述的是葡萄牙人在其管治澳門期間，不應干預這一我認為屬中國內務的問題。在澳門，由於通用數種中國方言，地方願望和國家合理需要之間存在一定的和明顯的分歧，以致相關問題應運而生。

當時，拙文未能促使葡萄牙人參與這個問題的討論，他們如“聾子”般充耳不聞；相反，在華人社會倒是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後來，我被邀請參加三月份在澳門舉行的“語言發展國際研討會”，出席會議的數十位語言學家分別來自中國、台灣、新加坡和香港。

我被要求在發言稿中詳述上文提到的幾個要點。

我這樣做了。發言題為《再論在粵語和國語之間，葡萄牙語摻夾其中且無從選擇……——對一篇文章的沒有必要的解釋》。

我寫的那篇文章本是針對葡人社會的，因此有必要在一個幾乎全是中國人的會議上作一個發言，以解釋文中非常葡人化的觀點。但是問題不僅僅是這樣，也不完全是這樣。

* 本文是《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之發言稿，該研討會由澳門社會科學學會主辦，於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舉行，此文對原稿已做修改。

** 澳門大學講師

我的文章旨在批評葡萄牙人（即我們）試圖“維護”粵語這一天真的嘗試，即通過語言或作為和 / 或不作為，把粵語作為對國語的一種“沖擊”。我認為，這種嘗試，其實是不夠真誠和全面地接受澳門的地方中文，並對葡語不再成為政府唯一和主要的語言而耿耿於懷。

通過這次會議，我解釋了澳門目前的語言狀況，即從葡語到葡語的傳統演講變為從粵語到葡語的演講，也算是歷史挫折感中的一次語言升華吧，或者說是佛洛伊德意義上的不完美行為：國語會廢棄葡語嗎？我們只是在暗地裏強化粵語這種具有雙重優越性的語言：即由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口頭掌握粵語，一旦掌握了，那麼粵語本身就無疑是一種能與國語產生語言文化之爭的語言。

對華人而言，大部份非土生土長，他們理所當然地維護“普通話”，而我的發言幾乎毫無意識地融進了地方文化的色彩——由此粵語和國語分別所具有的種種不同之處也顯現出來。

儘管沒有必要但仍要說的是，歷史上第一部成文作品是寫由於要防禦希臘人而令特洛伊人不敢輕卸武裝，而第二部作品，則寫為了奪取特洛伊城，希臘人以妙計取勝。如今《行政》雜誌也出妙計利用我這匹特洛伊馬作了善意的挑戰。所謂善意，體現在雜誌的形象，它通常以嚴肅、審慎的風格關注澳門本地的和文化方面的真實一面；這種善意，也體現在出版物是中葡文對照的；這種善意，還因為我不得不再次不斷地反思，“解剖”以前自己僅因喜好或個人和職業的角度去認識某一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並對此作一自我批評。

正因為如此，我欣然應邀，不過，帶着一些往往是中文修辭（也是葡語修辭）方面的問題。另外，我還將增加一些新的和有趣的內容，如澳門的語言，我認為這個問題對本澳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讓我們由葡語開始吧！葡語一直是澳門的官方語文，却從未通行於民間。

我相信葡萄牙人是極富懷舊情緒的人（如果允許在如此無法比擬的價值之間作一比較的話，那麼大部份葡萄牙人比其它國家的人更具這種情愫……），他們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無不懷念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這種懷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美化”（或“提煉”）、保留或延續本國的語言。

一系列分離的苦惱，使人試圖以主要是文學或類似文學的形式來渲泄，既浪漫又矛盾：所謂苦中作樂。這是葡萄牙文學常見的現象，其中已有不少情節被公開討論，恕不在此贅述。總之，從這一點來說，它是詩歌文學的總括。這種形式通常哀愁多於快樂，或者有快樂，但同時又有失落或失去所有的悲哀。

澳門作為中國使用葡語的地方，自然也抹不掉這種民族幻想的一面，我要重申的是它帶有一種文學性的色彩。隨着澳門政權即將回歸中國，這種既浪漫又矛盾的心理還會再深化。如今在過渡期裏已有某些象徵性的失落，以後還會被認為是失去所有，這實在是有人歡笑有人愁了。

很難設想澳門回歸中國這一自然統一能帶來什麼政治悲哀，而葡語的減少使用或中止使用所產生文化悲哀，作為統一後的派生物也易被公眾接受。

在此我要順便提一下，一些葡萄牙人，準確而言，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其文化和本身的思維已與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融為一體，似乎不太容易受葡萄牙文化和思維的直接而全面的同化。對我們而言。澳門和中國一樣都不是外國，其祖輩已是混血兒了，他們的民族幻想不同於那些剛從葡國來澳門工作的同胞。最後，客觀來說，除了公正的判定或歷史的決定外，沒有人否認隨着澳門將來的變化，葡萄牙在語言、政治和社會方面的重要性也會最終的和不可避免地削弱，且將以極其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生活在澳門的兩類葡萄牙人。很難說是否還能夠劃分哪一類是文學性的懷舊了。

在葡萄牙人的思維裏（其中常令人想起一位詩人的詩句：“葡萄牙語便是我的祖國”），講葡萄牙語的人數相對於最初的數字來說，已無形中在世界各地成倍地增加了，令葡人感到驕傲，然而這種驕傲仍然交織着失落的恐懼。我認爲，我們彼此都很難以英國的體育精神去接受和衡量語言的“失落”，也不能以集體和務實精神去計算其“贏取”之外。當然，由於分佈很散，發展到今天已經很不容易了：大凡葡萄牙人涉足過的地方大都使用葡文，如巴西和非洲；亞洲也有幾個殖民地是使用葡文的，其中帝汶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澳門，葡語從未成爲普羅大眾的語言，似乎僅是某些城裏人單純的懷舊，保留着它，主要是作爲文化的語言——一種學者的語言。

但是，又有誰能預計將來會如何？尤其是存在如此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和變數。越是這樣，我越覺得有必要指出的是，當一系列語言歷史問題是源自殖民地和殖民地語言的異同時，葡萄牙從來未爲此做過任何努力。換言之，葡語的發展停滯不前，是因爲缺乏規劃和實施全國性的語言政策，即使葡語能向外延伸，也不是有什麼政策所致。葡萄牙人總是忽冷忽熱，因而，“事情”總得不到解決，也不是爲了解決——實際上葡萄牙人對葡語仍抱有幻想，一直以來，他們都徘徊在高高在上的得意忘形和無能放棄的無可奈何之中。

葡語從未由極少數人的語言變爲公眾的語言，這在澳門是尤爲突出的。在此，借用我一個好學生一句精彩的評論：澳門土生所用的不是母語而是“父語”我們知道他們全是一種父與子的關係，尤其是在幼年，這種關係通過母親深植其中……葡語是父系社會少數人說的權威語言，但也相對受到其母語的壓力。

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中，除少數家庭與葡國有較多的聯系外（他們過去和現在仍以葡語爲其母語並日復一日地永久地使用），一個主要的趨勢是，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使用中文。正是這一點印証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語言社會學研究，那是1981年美國佐治敦大學的戴艾斯（Diez）的博士論文，題爲《澳門葡萄牙人語言的演進》，文中指出，對於澳門的土生葡人來說，“他們中大多數人以中文爲第一語言，無論與朋友交談或是在學校和辦公室都使用中文。但他們同老師，上司和牧師則說葡文”（1981，Diez）。

可見，受父權的影響，在行政機構、高等院校和宗教場所，澳門的葡萄牙人均使用葡語，且延續了四百多年，同時，他們也被無所不在的中文——其母系語言所潛移默化。語言的變化在短期內也不過是這些小的但影響大的權力據點的變化。中文成爲官方語文，不再是作爲通俗的口語，而是書面和學術的語言，澳門

的葡萄牙人將會學習中文的書寫。將來，葡萄牙人來到這片土地將會有新的發現（不再重複澳門的過去），即不僅“上司”講中文，牧師也越來越多地使用中文作為與信徒交流的語言，葡語將不可避免地失去其過去擁有過的語言優勢，這種優勢若說是社會性不免有點牽強，但是政治上的優勢却是實實在在的。

我認為以上提到的，並不是葡萄牙人社會以外，葡語的單純消失，而是在一些正規演講文件和申請書中葡語不再受用。或許從此轉向其它領域，或許變得更高深和饒有趣味，如博士著作、碩士論文或歷史文件等。

讓我們回顧一下，在“外來”人口大量湧入澳門以前，澳門的中國人對葡語的認識，僅限於一些有關買賣方面的詞匯（但在路環和氹仔，澳門的營地街市及一些由老人家經營的小店舖則不講這些話）。我懷疑中國人講的這些葡語，是否不過是對葡萄牙人的一份恭維和（或）對葡國遊客顯示自豪（荒唐嗎？），但這與中葡文化交流息息相關。中國人能講一些葡語句子，並不意味着他們掌握葡語，簡單來說，這種情況是頗為“典型”的，我們不能把它與葡萄牙旅遊文化層面上的葡語同日而語。不過從長遠來說，我們却可以在中葡文化的共通方面作點更有建設性的努力。最後，讓我們以不同的角度去闡述同一個問題，即在歷史的交接時期，人們不必掌握葡語，而是必要的“洋京邦”混雜語言去“對付”那些葡國主婦、老板和顧客。我們只需要為數不多的人與我們共事，共同研究葡語，作學士或碩士程度上的中葡文比較研究，以此推動中葡文化交流，諸如此類的想法不知是否太過樂觀？

現在，讓我們再來談談“雙重中國人”，即將來真正的雙語人材。

澳門人在不久的將來都能成為真正的雙語人材，我相信沒有人會持懷疑態度。他們在家裏或與朋友均使用其母語——粵語，甚至在某類工作上也用粵語；但在正規的或政治性的場合則使用普通話，這是當然的。問題是在於他們學習普通話的長短過程以及他們可達到的程度。

在澳門，如今只有那些過去或現在都沒錢，獎學金或家庭成員不能支持他們出外學習的人材不講國語，即所有的知識分子、商人或政治領袖都講國語。有一個例子是頗為典型的，即我在澳門認識了一個住在葡萄牙的富有的中國家庭，出於文化歷史的考慮，五十年代就從台灣請了一位國語老師教他們國語。此外，本地的一些中上層家庭也不甘落後，他們不僅講兩種語言，而且由於他們從事的職業所具備的特殊的社會地位，更希望把自己的兒女送進澳門唯一的自幼稚園用普通話和英語教學的學校。這所教會學校（莫非為了傳播福音而走在世俗權力之前？）四年前開辦時只有十二個學生，現在已有約三百人了。然而，以他們所擁有的財力去支付澳門如此昂貴的學費，難道如此付出的代價真的與他們的真實需要相吻合嗎？

澳門絕大多數人家的孩子並不具備這種財力，只好不亦步亦趨，過後再作打算，而令他們覺得有阻礙和有困難的便是國語的教學了。

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不重視國語的教育。如今政府收購的澳門大學已招收更多的本澳學生（這些學生也因此失去外出學習普通話的機會），但客觀上對某

些行業人仍有歧視，儘管主觀上並不希望發生。由於歷史和社會的原因，那些本地勞工和傳統的小業主們更應引起人們的重視和關心。

如今“支配”高等教育的仍是葡萄牙人和講英文的外國人，這些對教育責無旁貸者應顧及所有人的需要，我想強調這一點永遠不是多餘的。希望他們不再像以前曾經發生過的那樣限制或阻碍普及國語教育的提議。在近代社會裏，學校教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從社會的各種不同層面上，可以透過語言的通俗教育或權力語言的正規教育，以均衡方式減少社會差異。

我覺得學校所具有這一高度民主和社會化的職能似乎沒有很好地體現出來。在澳門大學我了解得多一點，它可謂是社會總體的一個縮影。掌握國語與否已經成爲社會、文化障礙，把學生分爲兩類：較富有的社會精英，他們順理成章的成爲“三語人”（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以及來自貧困階層的學生，他們只講粵語和不流利的英語。

當學生們完成了他們的學士課程以後，不管是文科或理科，他們都會越來越少地使用粵語，是否有人質疑，那些經濟來源較少的學生會比那些得天獨厚的學生因語言方面的阻碍（除經濟和社會地位外）而得不到重用呢？

由於國語和粵語兩種語言結構實際上是相通的，我們設想不用一年時間可以令講粵語的人講國語（儘管沒有北京音那麼“字正腔圓”，但至少社會交流完全過得去……），那麼，國語的教育至少不用在高等教育時才作普及，也不必成爲必修課了。

我所指出的解決爭議的途徑並非唯一正確的。這個科研和教學方面的問題同時也指出了要盡可能快地在各級教學中引進普通話教學。

作爲外語教師，同時又是外語學生，我正在學習中國語言和語言學，我可以指出本澳大部份大學學生不能說對中文沒有認識，然而却是片鱗片爪的，更甚的還是受歐洲語法理論模式的影響，連文學課程的學生也不例外，幸而這種情況爲數不多。從文學文化到視聽文化的轉變，其實最終是削弱了對母語的掌握，尤其是書寫方面。在澳門，由於粵語的特殊性，它將成爲日後通用的中文口語，但是，所有鼓勵更多學生更好地掌握中文書寫方面的倡議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中文書寫的唯一途徑便是國語的教育。

學生本身及其家長都告訴我他們是反對放棄國語教育的。我相信他們的確是這樣想的。首先，這並不是粵語教學從此過渡到國語教學，只是在課程安排上增加國語這一科，其次，我們可以採取不同的引導方法以收引更多的學生選修國語課，如課外補習、授予更多學分、減免更多學費、或發出更多獎學金給他們參加中國各大學舉辦的暑期培訓課程，等等，看來這只需要動動腦筋及憑一股熱心即可辦到的。

有一點我覺得不太明白的是我們唯一的一所大學，在語言方面（主要是集中在以書面學習爲主的文學課程），並沒有什麼積極的語言措施。這是可笑的，因爲大學培養學生無非是爲了他們將來具備職業的、社會和政治的競爭能力，而完全地掌握國語正是未來社會某些競爭性行業所要求的。

葡語系開辦的葡語學士課程設有國語必修課，其它院系很少開這門課，奇怪的是，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却可免修。

有人問我，粵語又如何？難道我們不應做點什麼？

我想是應該的，粵語本身是一種古老的和受尊重的中國方言之一，也是中國經濟較發達的省份的語言。幾個世紀以來，在東方的這片土地上，人們以中國人特有的忍耐美德日復一日地包容着來自西方的葡萄牙語。

我一直在捫心自問，我們作為葡萄牙人也是管治者，如何去回報這一份人情和表示一份敬意呢？尤其是當我發現粵語以其特有的地方性及其所受到的尊重，其實並不需要葡語的存在。可是，葡萄牙人從未正式地或集體地表示過任何的回報和敬意……

在此，我要奉勸葡萄牙人的一句話是：亡本補牢，未為晚也！在這些前因後果之下，我大膽地估計，在不遠的將來，下一次的語言之爭，將是社會政治同時也是文化之爭。

普通話的普及並不會使廣東話失去陣地。我們有整個廣東省作為一個好例子。我們認為一種地方方言失去陣地並不意味着失去講該方言的人，對中國人來說只是失去某些面子，失去一定的權力和地位。政治歷史如此不可逆轉，如何才是失去陣地或是贏取陣地呢？我們不應把它看作是地理上的擴張，至少在短期內不是這樣。我曾在黑龍江省（前滿洲國）的省會哈爾濱市的餐館吃飯，結賬時我們用“我們”（假如我也有資格這樣稱謂自己的話）慣用的“埋單呀”（MAI TAN A），當地人竟也能理解，由此也可見廣東省經濟文化之巨大影響力。我看這就是一種語言或方言（其地位最終是政治性的而非語言學的）的被確認，說明它作為大多數人的母語的延續，並在理論上得到加強，是不成問題的。也就是說，除了日常和應用方言的教學，還應對方言的規範結構、其歷史及其語法作系統性的教學。

在這一層面上，我想澳門政府可以採取不選擇或選擇兩者的態度。這樣，既可有益於那些社會較低階層的人，鼓勵他們能掌握國語；同時又有益於本地語言，因方言是呈弱勢的，培養精通方言的人材並為研究方言提供足夠的手段，這種情況在廣東和香港均未做到。

在上面提到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所做的是重申和確認粵語的真正意義，且建議在澳門大學或理工學院或任何類似地方正式成立諸如粵語研究所之類的機構，賦予完全的學術自主和財政獨立（有沒有地方的基金會呢？）。這個研究所本身將會成為粵語研究和粵語專業化的重要中心。如果學者們有興趣，還可以出版一些關於這一小語種的著作，隨後更可作有關的文化研究，諸如語言社會學、應用語言學、語言比較、語言歷史，等等……